

漢唐  
陽

#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四卷]

金冲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二十世纪 中国史纲

[第四卷]

金冲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第4卷 / 金冲及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097-1007-4

I. 二… II. 金… III. ①中国—近代史②中国—现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623 号

##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

著 者 / 金冲及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zongbianshi@ssap.cn](mailto:zongbianshi@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宋荣欣 桂 芳 陶 璇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销售热线 / (010) 62142489 62164516

排 版 / 蒋宏工作室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

开 本 / 700 mm × 1000mm 1/16

印 张 / 87.75

字 数 / 1136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07-4

定 价 / 128.00 元 (全四卷)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本卷目录

## 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113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远不限于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而且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局面，使它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起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重新理出头绪，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也开始全面起步，给社会主义赋予新的生机和活力。

## 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1175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来的。高举这面旗帜，就使十几亿中国人在前进中有了明确的方向。

## 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1219

在国内发生了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在国际上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生了西方七国的对华“制裁”；中国能不能排除重重困难，进一步打开一个新局面，再一次面对严峻的考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奋勇前进。

## 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65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紧紧结合在一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决断。

### 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1311

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作报告，郑重地宣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在新的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面对急剧变动而又错综复杂的新情况，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履行自己所肩负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深刻思考和紧紧抓住的三个要点。

###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1351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给后人留下无穷启示。

### 后记……1370

## 第二十四章

#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11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135

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放的起步……114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又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邓小平把这次改革开放称为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它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开创出这样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十分不易。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种条件都已具备的顺利环境下开始的，相反，倒是在异常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迈出它的第一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以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积累下来的矛盾实在太多。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广大干部和群众急切地期待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这条路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怎么走，开始时并不很清楚，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因此，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有过两年在徘徊中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改变了这种徘徊局面，明确地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以后，又经过三年多实践中的探索，终于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确地得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

##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祖国从危难和挫折中得到拯救。人们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热情地准备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去。可是，十年动乱留下的后果太严重了，整个国家百业待兴，问题堆积如山，思想也很混乱。应该从哪里起步？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揭批“四人帮”，一件是初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所说的“抓纲”依然是指六十年代以来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它的具体内容已有差别，主要是指揭批“四人帮”，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消除“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流毒。这在当时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时，“四人帮”和一批骨干分子虽已被隔离审查，北京、上海以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局势虽已迅速得到控制，但他们多年经营的帮派势力遍布全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有些还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他们“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封官许愿，拼凑黑班底”。〔1〕对这些人，如果不认真清理便会留下重大隐患，发展国民经济便难以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中进行。在极少数仍被“四人帮”余党把持的地方，局势依然很混乱，武斗尚未停止。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先把保定地区和郑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的混乱局面稳定下来。同时，在各地区、各部门进行深入细致的清查工作，把“三种人”（即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清理出来，特别是不让他们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由于“四人帮”在很长时间内

---

〔1〕《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8日。



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目出现的，跟着他们做了错事坏事的人中间情况相当复杂。因此，在清查工作中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别对待，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规定：

“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当中，属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的，只是极少数。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对于一切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又不肯悔改的死党。”〔1〕

清查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摧毁了“四人帮”残留的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各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由于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政策恰当，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这个长期使人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且始终保持着社会的稳定，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和混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就全国范围来说，清查工作基本上胜利结束。”〔2〕

---

〔1〕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2〕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由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制造了许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们又把安定团结说成“阶级斗争熄灭论”，把反对派性说成“整造反派”，把将国民经济搞上去说成“唯生产力论”，把四个现代化说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物质基础”，还要求“层层抓、抓还乡团”。因此，从思想上批判并消除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的种种流毒，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要求把“四人帮”的谬论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一条一条地批深批透。十二月起，中共中央将“四人帮”的罪证材料（一至三）陆续下发，其中“之三”就是“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都以大量篇幅刊登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拨乱反正，分清是非。其中，如杨逢春等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薛暮桥的《批判“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反动谬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胡乔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文章，都产生很大影响。

国民经济在这个时期内也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本来，一九六九年开始的七年间，经济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下，经过全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辛勤劳动，国内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四三。而一九七六年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唐山大地震，国内生产总值又一次出现下降，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六，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二点四，而钢产量下降百分之十四点九，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零点四。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热切期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决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尽快地夺回来。”这确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情。他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一九七七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其中钢产量增长百分之十六点零三，农业总产值仍下降百分之零点四；一九七八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一。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如武汉钢铁厂一米七轧机、葛洲坝水电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取得重大进展，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在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帮助下也完成了动工的准备。国务院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从该年十月一日起提高部分职工工资，全国有百分之六十的职工共三千多万人增加了工资，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十年内第一次为职工提高工资。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决定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稿费制度也恢复了。

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最初进展不快。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邓小平、陈云等支持下，顶住各种压力，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推进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2〕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大规模的积案复查工作。一九七八年这一年内，中央组织部直接办理和复查平反了一百三十多名副省级、中央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大案要案。胡耀邦还提出：原国家干部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要尽快作出。这样，使大批有经验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各地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提出：“纠正冤假错案非抓不可！对于真正冤屈的、搞错了的，就得平反，就

---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2〕《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6页。

是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你们工作胆子要壮，不要有顾虑。”〔1〕甘肃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在“四清”运动中被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权”的典型，这个报告经中央批转全国，造成很大影响。经过十个月的复查，甘肃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冶金部共同给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后得到彻底平反。省委还组织工作组或调查组到各高等学校，帮助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又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我们广东过去搞‘两退一插’（引者注：指职工退休、退職和到农村插队），把很多教师弄回家了，到目前仍有五千三百多人尚未复查处理，还在一边摆着。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现在首先要落实人家的工作，然后再复查。”〔2〕

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分别选出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相继恢复活动。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说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指它虽在“徘徊”，但比起过去来是“前进”的。为什么又说它在“徘徊”呢？因为当时在领导思想上还存在着两个大问题，对中国的前进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第一个问题：在根本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受着严重的束缚，不敢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真正解脱出来。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集中体现和宣传了这种错误主张，它写道：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1〕 牛颖、彭效忠：《宋平在甘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04页。

〔2〕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70页。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

既然毛泽东作出的一切决策和一切指示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好，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评价也好，都得始终不渝地维护和遵循了；只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或点头而做错了的事，都不能触动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的就是这种思想。他在这年四月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中写道：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实现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2〕

这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要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华国锋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它依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它的错误理论。报告说：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

〔1〕《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2〕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

“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

这样，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其他几个领导人仍要坚持这样的思想呢？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样分析：“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2〕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便无法走上一条成功的新路，便谈不上开辟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当时有这种思想的并不只是华国锋一个人。因此，要冲破这个障碍十分不容易。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工作方面。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处在异常兴奋的精神状态中，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摩拳擦掌地想大干一场，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性增长，又使不少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看有利条件多，看困难和问题少。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工作中再次发生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错误。

这仍是“左”的错误，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再出现的顽症。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

---

〔1〕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617、618页。

寨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但未能认真考虑客观实际的可能，对农业生产指标和人民公社公有化水平提出了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一九七七年一月，国务院又要求到一九八〇年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五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话，把这两次会议称为“是力争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预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他说：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刻不容缓的了。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所有企业，都要努力向大庆看齐。各个工业部门，都要努力向石油部门看齐。各个省、市、自治区都要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1〕

这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汇报》在二十三年设想中提出：“在二〇〇〇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粮食总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钢产量达到一亿三千万吨。”〔2〕随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对它进行讨论，并由中央将《汇报要点》转发全国。

在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将根据二十三年设想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全体代表审议。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按照十年规划，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六千万吨。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八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四点五，工业总产值每年要增长百分之十以上。这八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

〔1〕 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7年5月13日。

〔2〕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1977年11月15日。

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二十八年增加的产量。这八年，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1〕报告提出，今后八年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等。这些项目大多是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根据大会通过的这个规划，各部门、各地区纷纷筹划此后八年的新的“跃进”，提出许多无法做到的高指标。

要求加快发展，本来是好事。问题在于，这些主张严重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经过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经济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比较突出的，一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需要重新调整过来，达到基本平衡；二是人民生活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欠账”需要逐步解决；三是被严重打乱的规章制度和经济管理工作需要重建和整改；四是经济增长不能缺少的许多基础工作需要做好准备。如果对这些都置之不顾，单从人们在粉碎“四人帮”后那种普遍的兴奋和热情出发，想靠“革命加拼命”，就要求国民经济实现如此高速增长，它的后果必将出现新的大起大落。“有如重病初愈的人，不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恢复健康，就要求他跑步前进，这没有不摔跤子、不出问题的。”〔2〕

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尽管人民有着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但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只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恶果。这样的痛苦教训，以往已经够多了。

好在当时所说的“全面跃进”大体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设想，没有也不太可能全面付诸实施。在这两个问题中，比较起来，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前一个问题，也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后一个经济方面问题的解决主要还得放在下一步。只有前一个问题解决了，把“左”的指导思想扭转和纠正了，后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顺利而妥善的解决。

---

〔1〕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2〕 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第395页。



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后期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中，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那一年，他已七十三岁。在全会的讲话中，他说：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1〕

那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之多，难度之大，是罕见的。许多人一时还看不清怎样才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又不能只停留在应对当前种种迫切而棘手的问题，还要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形成一条全新的思路，为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必须在不长的时间内同步完成。

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衡量全局，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指明一条新的出路。步子从哪里走起？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他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

恢复工作前，他在四月十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五月二十四日，他对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可见在他看来，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

〔1〕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2页。